

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

胡 世 林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本草纲目》是十六世纪我国进步的医药科学家李时珍的一部名著。李时珍生活在明代中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儒法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他的思想、实践活动和著作必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因此,研究李时珍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原因,分析儒法斗争对于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影响,对于弄清是谁创造了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是谁阻碍、破坏医药科学的发展,在批林批孔运动朝着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人民创造医药的见证

李时珍之所以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位科学家,首先在于他以劳动人民的一分子,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防病治病的实践。他行医、采药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城乡渔村、矿山作坊、深山密林都是李时珍进行调查采访的场所,大自然和社会生活就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劳动人民是他学习的老师。李时珍一生的活动和《本草纲目》全书,闪耀着劳动人民创造医药的智慧和光芒。

李时珍所走过的是一条实践出真知的道路。在儒学盛行、科举禁锢的时代,他早年弃儒为医,中年又毅然辞去医官不做,甘与村夫渔民、矿工猎人为伍,致力于医药事业,这是对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的否定。在李时珍编写出版《本草纲目》的过程中,一直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学生和子孙,更重要的靠千百万劳动群众,完成了一部一百九十多万字的巨著。李时珍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群众的生动语言总结记载药物的准确功效。“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就是最为突出的一例。寥寥数语,既表达了药物的疗效是劳动人民实践出来的,又显示了李时珍和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此外,象“舍命吃河豚”,以及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加工,各种酿造品的制作工艺,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述,为我们展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具有强烈的人民性。

《本草纲目》收录了 1,892 种药物。其中经过李时珍发现、总结而首次载入的新药达 370 多种。驰名中外的“三七”,是李时珍首先给予详细描写和正确总结的,并指出“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又据李时珍记载,“三七”产于广西深山中,是当地人民在实践活动中,首先用于治疗跌打损伤之类的疾病,效果较好,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李时珍对于“三七”十分重视,肯定了它的性味功能,以及与菊叶三七的区别。并且说三七“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我们知道,人参和“三七”是同科同属植物,都含有皂甙一类化

学成分。李时珍能发现人参和“三七”味道方面的相似之处,这就说明,他如果没有亲自尝一下“三七”滋味的实践精神和由此及彼的思维方法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准确的判断的。金银花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药物,原来是“用藤”,叫“忍冬”,也是李时珍在实际观察中,见其花由白变黄,才首次记载了金银花这个民间的名称,他写道:“花初开者蕊瓣俱白色,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气甚芬芳,四月采花,阴干。”这段描写不论从植物学角度,还是从药物学的角度来看,无疑都是科学的。他又指出,金银花可以清热解毒,这与现代科学实验证实金银花有抗菌消炎作用的结果是一致的。白花蛇又名蕲蛇,是李时珍家乡湖北蕲春县产的药材。李时珍对它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不仅亲自到山上观察白花蛇的生活习性,了解捕捉它的方法,研究药肆上白花蛇的品种,而且还用水浴法自行配制“濒湖(李时珍晚号“濒湖”)白花蛇药酒”,用以治疗骨节疼痛等症。由此可见,李时珍在制剂方面也是有所研究的。曼陀罗花,虽然在李时珍以前就作药用,但全面记载该药的来源、形态、性味,则以《本草纲目》为最早。为了证实它有使人笑舞的作用,李时珍亲自作试验,并且运用前人的经验同火麻子花配合,作麻醉剂,施行外科手术:“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皆昏如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这两种药的麻醉镇痛作用已为现代医学实践和药理研究所证实。这就充分说明,实践是医药科学的唯一源泉。

总之,《本草纲目》以历史的真实,告诉人们,药物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医药科学的真正的主人。

《本草纲目》的成就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胜利

李时珍对于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医学上,他首先提出脑为机体活动主宰的见解;在药剂上他记载了蒸馏、升华、重结晶、水浴加热等制药方法;在毒物学方面,他首先记载开采铅汞时所引起的职业中毒和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在地质学上他第一次记载了粪化石;在生物学上他开始产生了进化的思想。

李时珍在科学上作出卓越成绩的原因,主要是他在实践中逐步地、自发地掌握和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变化的,各有其规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是无穷尽的。李时珍说:“是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遇怪耶?”在谈到金银花的应用的时候,李时珍说:“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概论也”,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方面,也有同样的例子。他进一步肯定了前人的一些正确见解:“上则为雨露霜雪,下则为海河泉井”,“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在医学实践中,他反对“一方通治百病”,反对“千篇一律”,“先入为主”。他主张辩证论治,对有毒药物,既要看到有毒的一面,更要看到用之得当可以治病的一面。例如,在批判方士服食水银以求长生的行为时就指出:“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其繁,而执其枢机焉”。这些都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李时珍是历史上坚持医药结合的典范,他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在中医基本理论方面,也很有研究,尤其突出的是对脉学的研究,著有《濒湖脉学》。此书在今天中医临床上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药物的配方应用,李时珍更是十分重视,他说:“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由于有这种思想的指导,才使他收集各种附方达一万一千多个。在黄连一药之下,记载的附方就有 62 个。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在“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的问题上,李时珍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他编《本草纲

目》时参考的各种书籍有八百多种。他下这么大的功夫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好古”、“尊古”,更不是为了“复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存古”,为了“是非有归”,为了“采其精萃”、“正其谬误”。这种对历史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由此出发,他大胆解放思想,主张前进、革新,提出要“发前人未到之处”,认为后人可以而且应该超越前人。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就专列“发明”和“正误”两项,记载当时人民群众和他自己对药物品种、功效的新发现、新见解,以纠正前人的错误。

李时珍主张前进和革新的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药物分类的改革上。他不沿袭一千多年来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试图从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进程来对药物进行分类,勾画了一个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线索。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虽然这种分类法有很大的缺陷,甚至有很严重的错误,但基本上符合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李时珍公开声明,他的分类方法是,“从微至巨,从贱到贵”。这里所说的贵贱是指高低而言。例如,在封建社会,龙被视为神物,是天子的象征,仍被李时珍列在鳞部,处于较凤凰、猩猩为低的地位。他对于部类以下的植物,也注意到把相近的种类放在一起。例如,列当科的列当、肉苁蓉、锁阳三种药是紧挨着的;葶藶、菝葜、土茯苓等百合科菝葜属植物也是排在一起的。在当时,李时珍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最先进的。同时,李时珍还觉察到生物的变异现象,而且这种变异可以用人工方法干预。例如,野象的驯化,金鱼颜色的变化,在《本草纲目》中都有实录^[1]。我们知道,欧洲直到十八世纪还处于“物种不变论”的统治之下,而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却大肆贩卖什么“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黑货,这只能暴露他们与人民为敌的洋奴卖国贼的嘴脸。

十六世纪初,即比李时珍仅早几十年的时候,明朝统治者也曾组织了四十余人编修一部本草,名叫《御制本草品汇精要》^[2]。但由于受儒家反动思想的束缚,受“宿命论”和“历史退化论”的严重影响,他们因循守旧,不敢超越前代,除了“悉尊《神农本草经》分为三品”之外,还宣扬“无为而治”的腐儒思想,甚至把司马光的死党邵雍编的《皇极经世》一书中的唯心主义分类方法,引进了药物学的领域。以草部分类为例,这本书就分为草之草,草之木,草之飞,草之走,完全违背植物的生态习性规律,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在分类学上的突出表现。而李时珍则不然,他把草部药物分为芳草、隰草、蔓草、毒草,就是比较接近于科学的分类法。因此,明朝统治者尽管组织了四十多人进行编修,人员比李时珍要多得多,各种条件也比李时珍要强得多,但却没有能作出独创性的贡献。

以上对照,充分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医药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李时珍能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攀登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高峰,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天才,而主要是因为他参加了当时医药的实践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缘故。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在科学史上的胜利。《本草品汇精要》的作者们不能作出独创性的贡献,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愚昧,而是由于儒家复古倒退反动思想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束缚的必然结果。

儒法斗争对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影响

李时珍生于1518年,死在1593年。这正是明朝封建危机加深的时期。他经历了官僚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推行儒家路线和封建社会末期法家代表人物张居正执政的两个阶段。张居正执政的十余年间,正是《本草纲目》写成的关键时刻。张居正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理论,批判孟轲的“法先王”,高度肯定荀况的“法后王”,这对李时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张居正在政治上积极主张变法革新,推行法治,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抵御倭寇

骚扰,富国强兵,安定了人民生活,这同样也有利于李时珍后期的编写、采药、调查等活动;而且商业和贸易的发达,也使李时珍有机会研究更多的外来药物。

李时珍一生活中,明显地表现了尊法反儒的倾向。他继承了法家的进步思想,在所参考的经史书籍中,有历史上重要的法家和科学家如王充、祖冲之、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和沈括的著作。李时珍对五行作出物质的解释,明显的受到《内经》和王安石的影响,他把金、木、水、火、土作为五种物质元素来看待,而不是象思孟学派以至后来讲阴阳五行的谶纬神学那样,歪曲成为神秘的东西。更为突出的是,他继承了荀子“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通过大量的长期的实践活动,发现人的力量是伟大的,药物的升降浮沉的性能,是可以用人力来改造的,所以他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既指出了药物性能自有其物质基础,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改变,关键在于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即他所谓的“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就是说,你不了解药物的固有性能,就不能对它进行改造。这也是李时珍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从历史上法家著作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时,又以自然科学上的新进展,论证和支持了法家的前进革新的观点。

《本草纲目》里有关药物的叙述,李时珍也常引用法家的论述。例如,钩吻,古代又叫野葛,李时珍根据王充的考证,认为“野”字应为“冶”,是地名,而不是野生的葛藤,并且称赞“其说甚通”。又如,唐宋时代,常误认为豨薟草和猪膏草是两种植物,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指出这两个名称,实际指的是一种植物,李时珍“常聚诸草谛视”后,证明了沈括的说法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李时珍用亲身的实践批判儒家。例如,有人问孔老二一种(据说是难辨认的)植物,他胡诌了一个“萍实”的名字,后来的儒生,以此吹捧孔老二“博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这种植物实际上就是“萍蓬草”。“萍实”这个名称,易误解为浮萍的果实而未加采用。他这种不以儒家“圣人”之说为是的态度,与他同时代的法家杰出思想家李贽所提出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是相通的。而且李时珍注重实践,不入仕途,在《本草纲目》中用了许多篇幅来叙述种药的土壤、播种、施肥、灌溉和采收等经验,以及如何宰牛、制药等方法,是对孔老二骂樊迟学稼为小人,孟轲之流所鼓吹的“君子远离庖厨”的有力批判。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认识论方面,李时珍明显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他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认识到很多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他说:“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物之性理万殊,人之用舍宜慎”。而且进一步指出“格物无穷”。这些观点,都是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有力批判。正因为如此,他把不深入实际、妄下结论的人斥责为“未深加体审,唯据纸上猜度而已”。指出这种恶劣的学风是“浅学立异误世,鄙人据以为谈”。可见其对唯心主义先验论之深恶痛绝。李时珍不仅在理论上加以批驳,而且亲自实践,把相似的易混淆的植物,“一一采视,颇得其真”,从而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分清了历史争论已久的苹、荇、蓴、萍等各种植物。对于容易弄错的昆虫,他也应用同样方法,进行比较、鉴别。

李时珍对于当时风行的王阳明的“心学”也是鄙弃的。王阳明二十岁时,曾在竹子面前静坐了七天,进行“格物”,得不出竹子生长的规律,于是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整套极端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3],而李时珍反其道而行之,长期观察,深入调查,正确地描述了竹子由笋成竹、开花结实的生长过程,记述十几种竹,并指出其经济用途,可作房屋梁柱,造船制绳等,不仅内容丰富,远超前人,而且也是对“心外无物”论的否定。

尽管如此,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社会的影响,李时珍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有时也宣扬儒家的“天命观”,如说什么“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因而使他陷入唯物

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之中。他一方面不信“草子变鱼”，一方面又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的谬论；一方面斥责迷信鬼神为邪说，一方面又提倡古镜可以避邪魅。也就是说，在李时珍朴素的唯物论中也还掺杂了不少这类封建糟粕性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吸收《本草纲目》科学的、民主性的精华的过程中，必须加以批判和扬弃的。

*

*

*

《本草纲目》问世以后，有见识的学者，都认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称赞是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的好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因而传播日益广泛，为中外所闻名。特别是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本草纲目》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本草纲目》“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都由历史的经验，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本草纲目》在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已经刊行了二十多次，在国外先后被翻译或节译成英、德、法、日、俄等多种文字，其中英文译本竟达十几种之多。这种传播的盛况是科学史上少见的。然而有些主张复古尊经的儒医则妄图诋毁《本草纲目》的价值，甚至扬言要别人烧掉《本草纲目》，才可以与之谈论医学。这只不过是医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

但是，在《本草纲目》的传播上，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儒家的阻碍作用。金陵版即第一版《本草纲目》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科学资料，封建统治者，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保存，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金陵版的《本草纲目》在国内近乎绝版^[1]，而国外所存倒比国内还多，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儒家崇洋卖国路线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干扰和破坏。

《本草纲目》的写作、出版和流传的历史有力地说明，医药学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法家进步革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个连举人都考不上，也没有受过正规医学教育和专门训练的李时珍，能够在科学上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和“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决裂，重视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亲身参加实践的结果。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宣扬“儒家是我国文化的来源”的反动观点，必须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总结劳动人民创造医药的历史经验，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奋斗。

参 考 资 料

- [1] 蔡景峰，科学史集刊，7，63，科学出版社，1964。
- [2] 刘文泰等，本草品汇精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
- [3]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307，人民出版社，1966。
- [4] 王吉民，李时珍《本草纲目》外文译本谈。1953，4，203。